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 第十一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西洋鏡



东方历史评论

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

[英] 托马斯·阿罗姆 绘 [英] 乔治·N. 怀特 著 赵省伟 编译



彩色典藏版

版社

东方历史评论·影像

| 第十一辑 |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西洋鏡



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

[英] 托马斯·阿罗姆 绘 [英] 乔治·N. 怀特 著 赵省伟 编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洋镜：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 /
(英) 乔治·N. 怀特著；(英) 托马斯·阿罗姆绘；赵省
伟编译. —北京：台海出版社，2017.5
ISBN 978-7-5168-1433-8
I. ①西… II. ①乔… ②托… ③赵… III. ①中国历
史—史料—清代—图集 IV. ①K249.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1660 号

西洋镜：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

著 者：[英] 乔治·N. 怀特 (著) [英] 托马斯·阿罗姆 (绘) 编译者：赵省伟

总 策 划：科文图书 监 制：薛 婷 责任编辑：俞滢荣
策划编辑：樊 秀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 (发行，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博海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22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8-1433-8

定 价：1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西方最早、最著名的绘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

2014年，我创建工作室，整理出版海外中国相关史料，围绕“中国服饰与风俗”这一专题相继出版了《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风俗图鉴》（英国人梅森的1800年版《中国服饰》）、《西洋镜：中国衣冠举止图解》（马戛尔尼使团随团画家亚历山大的1805年版《中国服饰》、1814年版《中国衣冠举止图解》）、《西洋镜：清代风俗人物图鉴》（英国人梅森的1801年版《中国刑罚》），刻下即将出版《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中国服饰与艺术》（法国人布列东的1811年版《中国服饰与艺术》）等。这些著作均为海外汉学研究某一领域的扛鼎之作，受到了很多媒体和读者朋友的喜欢。

比起以上那些选题，“阿罗姆”耗费了我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三年多的时间里，我花费了一笔不菲的费用从海外购买了这些手工上色的版画。收到的版画有原框的、破损的、做旧的等等，也听说一些出版社正在做这个项目，因此，我一度想放弃这一选题。事实上，在此期间确实有两个版本的书出来，好在都是黑白版，与我想做一本彩色版《中华帝国图景》^[1]的计划并不冲突，这也从侧面说明阿罗姆的书具有较好的市场预期。

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阿罗姆的《中华帝国图景》便在伦敦出版。全书分四册，收录了128幅钢版雕刻的插画，文字部分由爱尔兰作家乔治·N·怀特执笔。1845年德文版本首版，1858年英文再版时增加了39张其他作品。由于制作精美、内容丰富、视角独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景观、山川形势、社会文化以及对外贸易与交流的情况，该书出版之后，很快成为英国乃至西方最早、最著名的绘画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当时欧洲人，尤其是欧洲主流社会关于中国的知识大部分都源自这本书。

托马斯·阿罗姆1804年出生于伦敦南部的兰贝斯，父亲是诺福克郡的马车夫。阿罗姆1819年起在建筑师古德温的事务所当学徒，1826年进入英国皇家美术学

[1] 编译出版时，为了使《西洋镜》丛书在体例上保持一致，更名为《西洋镜：一个英国皇家建筑师画笔下的大清帝国》。——编者。

院学习建筑设计。毕业后，阿罗姆成为了英国的顶尖设计师之一，主持设计了圣彼得教堂、海伯利教堂、肯星顿公园等建筑，还参与设计了英国议会大厦，以及筹办创建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19世纪20年代起，阿罗姆接受出版商委托，为旅行类书籍绘制插图，为此，他走遍了英伦全岛以及欧洲各地。1834年，阿罗姆远赴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创作了数百张富含浓郁东方风情的画作，1838年，出版了《康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七座亚洲教堂的风光》。阿罗姆晚年健康状况不佳，饱受心脏疾病的困扰。1870年，阿罗姆退休，两年后去世。

虽然阿罗姆足迹遍布欧洲，并且一度到达土耳其、巴勒斯坦等国，但是，他却从来不曾到过中国。阿罗姆是以威廉·亚历山大的画作为基础，参考相关文字描述，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创作了《中华帝国图景》一书中大多数的画作。

大体说来，书中运河沿线以及北京、天津等地的绘画，均是根据亚历山大的原图绘制。有些作品，阿罗姆并没有改变原作的整体构图，只是稍作改动，比如《西直门》，阿罗姆删去前景中无关的人物，拉近观赏者与城门的距离，使得城楼、城墙与城门更加挺拔雄壮。而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中，阿罗姆根据相关文字记载，还原了皇帝进入大殿时的场景，比起亚历山大的原作，场景更丰富，也更生动。《热河小布达拉宫》《中国长城》《天津戏院》等作品同样也是如此。对于亚历山大创作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阿罗姆稍作改动，将他们融入到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在《临清的街头表演》一图中，这种情况最为明显。吹笛子的乐手无疑来自亚历山大的《流浪音乐家》一图，原作中的音乐家演奏的是胡琴。木偶戏表演的场景来源于《街头表演》，操作木偶的表演者从神情举止到服饰装扮都酷似亚历山大笔下的书商。为了使整个场景更真实、富于生活气息，阿罗姆还添加了形态各异的观众。选取亚历山大笔下不同的人物与场景，重新拼贴、融合，创作出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卷，阿罗姆深谙此道。

此外，《南京城》《南京琉璃塔》《从琉璃塔俯瞰南京》《金陵桥》等作品，则是阿罗姆依据17世纪荷兰画家纽霍夫的画作以及相关资料创作而成。《香港》《澳门妈祖庙》《澳门的寺庙》是阿罗姆在法国画家奥古斯特·波塞尔原作的基础上创作而成。鸦片战争相关的画作，则是阿罗姆根据英国随军画家创作的速写以及战地记者创作的战争场景绘制而成。

阿罗姆认真研究了其他画家的作品，既忠实于原作，保证了画作的写实性，生动地还原了中国的社会特征，又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赋予这些画作更高的艺术价值。不同国家的读者之所以还能在各类著作中不时看到阿罗姆的名字，原因正在于这些极具艺术性和历史价值的风俗画。

乔治·N·怀特约1794年出生于都柏林。大学就读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于1814年、1817年分别获得本科、硕士学位。搬去伦敦之前，他曾在爱尔兰多个地

方担任副牧师。1851年，他在温莎的一所学校教授古典文学，1863年，还曾担任过文法学校的校长。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他曾经编写了一批供学生阅读的书籍。此外，他还编写了一批风俗画册，比如《都柏林历史指南》（1825年）、《图说爱尔兰》（1831年），以及《中华帝国图景》（1843年）等书。

和阿罗姆一样，怀特也没有到过中国，本书写作过程中，他尽可能搜集丰富的材料，广泛参考、大量引用了前人有关中国的相关论著。其中，既包括《马可·波罗游记》，也有西方传教士、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以及鸦片战争中英军士兵的书信与回忆录。在1858年修订版的序言中，他不厌其烦，大段引用英国第四任驻香港总督宝宁的通信。此外，书中还有大段的文字直接引用法国人布列东的《中国艺术与服饰》，以及出版于1834年的《中国缩影》。这些文字配合着阿罗姆的插图，向英国民众展示了一个古老、神秘而又陌生的中国，深受读者的喜爱，因此得以多次再版。

后世读者对阿罗姆的画作交口称赞，对怀特的文字却颇多指摘。尽管有着种种缺点与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阿罗姆创作的这些精美的彩色版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史料价值。让我们跟随阿罗姆的这些版画，进行一场时空穿越之旅，饱览170余年前中国大地上壮美的山河，重温那段交织着美景与战火的历史岁月。

编者

| 摄影与版画^{*}

曾璜

在 20 世纪初照相印刷术尚未完善之前，版画是最重要的视觉传播手段，摄影术拍摄下的影像主要借助于成熟的版画印刷术传播。近年来，依据照片视觉组构制作的版画作为早期摄影史重要的视觉表达形态，作为反映 19 世纪绘画与摄影交织的艺术形态，逐渐得到了摄影史学界的关注，国内外出版的许多摄影史专著已经将“摄影版画”作为 19 世纪影像传播的重要形态纳入研究的视野中，预示了艺术史和摄影史研究的新领域。此外，早期中国摄影版画也出现在收藏和拍卖市场，如华辰影像 2014 年春拍推出的“摄影版画”专题，成交率高达 91%。摄影版画作为中国收藏市场新出现的一个品种，已经成为艺术品收藏和艺术品金融投资的价格洼地。

一、中国摄影版画小史

中国的版画术早于西方，主要为宫廷致力于历史的美化与教化，而非传播和告知大众。^[1]中国的版画分为年画和版画，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十分流行，明代话本小说流行之时正是中国古代版画的黄金时代。^[2]但是在中国，无论是文字印刷还是图像印刷，都止步于匠工，而未能成为艺术。1884 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当属早期最重要的采用了版画的大众媒体，但少有依据摄影作品制作的图画。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世界列强主要的殖民对象和西方媒体主要的关注对象。而摄影作为工业革命最为重要的发明之一，迅速得到应用，成为最重要的记录和传播工具，“摄影版画”也成为了西方了解和报道中国（东方）的主要视觉媒介。

目前掌握的史料表明，在西方媒介上最早出现有关中国题材的版画是 1665 年，荷兰人约翰尼斯·纽荷夫（Johannes Nieuhof）将自己从澳门到广州的见闻画成素描后，采用铜版画的形态发表于《东印度公司使节团访华纪实》中。早期艺术史上因创作中国影像而闻名的版画艺术家有两位，他们是 18 世纪的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和 19 世纪的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 年）。作为 1793 年英国外交使团的随团画师，亚历山大将在华所见的山水、人物、建筑、礼俗画成水彩画，并制作成铜版画集。与两位前辈不同，阿罗姆没有到过中国，他主要借用了亚历山大的画稿及相关文字记录，创作出 120 多张铜版画，

^{*}该文初稿于 2014 年，2016 年年底修改，配图版画为影易时代、曾璜和 LAURA HUANG 所收藏。希望本文有助于读者更加清楚地了解阿罗姆的版画在中国影像史中的地位。——编者。

[1] 陈丹青：《历史与观看》，《西洋版画与北京城》，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 年。

[2] 马未都：《京华遗韵》前言，新世界出版社，2008 年。

成就了西方早期最著名、最经典的中国近代影像。虽说绘画透视学和解剖学在 15 世纪已经成为了西方绘画的基础，但是阿罗姆的这些画作在视觉表达上并没有严格地遵守摄影透视学的原理，而且视觉符号带有明显的西方元素，这些遗憾都为“摄影版画”留下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和余地。

18 世纪，西方艺术家把西方版画带到中国宫廷，清朝皇室得以领略西方艺术的魅力。后来，乾隆皇帝把《乾隆西域武功图》送到欧洲，制成版画，以彰显自己的赫赫战功。同时，这也为版画这种艺术形态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环境和社会基础。皇权和政治的介入，推动了西方版画艺术在中国的流行。

此时的西方艺术也将关注点从宗教转向了社会和人，出现了肖像画、风景画和静物画，对诞生于 19 世纪的摄影产生了深深的影响。^[1]当然，摄影术也反作用于艺术，特别对平面的、绘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更形象地说，摄影术改变了中国画师处理透视关系时的幼稚和随意，让他们自然地引入了西方成熟的艺术技法。^[2]在中外视觉文化交流领域，摄影术不仅对中国艺术的视觉构成（特别是透视和真实描写）影响巨大，也彻底改变了中外艺术交流最重要的品种“外销画”的形式和构成，外销肖像画兴起，外销礼品画消亡。^[3]

以照片为母本的“摄影版画”与传统版画相比较，不仅在视觉构成上更符合人眼的习惯，还有对动感的捕捉和对现场感准确的描述。“摄影版画”大量地应用于报刊和图书出版中，并出现了铜板、铁板、木版和石版等多种形态。

“中国的印刷业起步较晚，跨过了版画制版印刷，直接进入了照相制版，让国人无法理解前照相制版印刷过程的复杂。在照相制版成熟之前，书报画刊上的每张‘照片图像’需单独制版，经历画师（摄影师）、版画家和刻板师等多层的创作和制作”^[4]，这正是早期“摄影版画”的魅力所在！随着照相制版术日渐成熟，纪实报道性的视觉表达逐渐为摄影所取代，“摄影版画”在 1920 年前后逐渐式微，最后成为了小众的版画艺术。

二、摄影版画中的历史

“源于 15 世纪的铜版画和源于 18 世纪的石板画等同于今天的影像”^[5]，具有很

[1] 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 年。

[2] 吕澎：《美术的故事：从晚清到今天》第一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江滢河：《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 年。

[4] 秦凤：《西洋版画和北京城》前言，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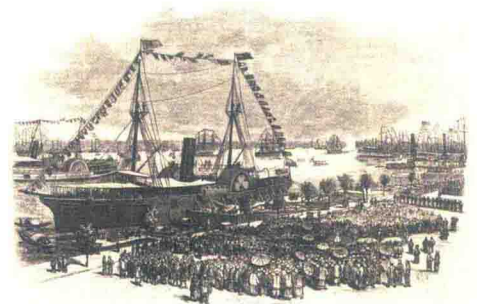
[5] 陈丹青：《历史与观看》，《西洋版画与北京城》，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 年。



中国人力车，约 1880 年，
根据威廉·桑德斯等人拍摄的照片制作



福建闽江水口镇，彩色水版画，
1882 年，《马六甲、南中国海和中国》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上海盛况，
水版画，1879 年，《莱斯利周刊》

高的史料和传播价值。1876 年 9 月 2 日^[1]和 12 月 23 日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两次采用依据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拍摄的照片制作而成的版画，来报道“中国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营”这一新闻事件，画面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当时上海万人空巷的场景。作为版画母本的原版照片却很少见到，这些底片很可能在 1888 年上海南京路森泰照相馆失火时损毁了。幸运的是摄影版画不仅让当年的读者身临其境地看到了发生在远东的现场，也保留下了这个场景，让后人得以穿越时光，回看 140 年前的景致。还有 1875 年出版的《马六甲、南中国海和中国》（*Mal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一书刊登有一张闽江水口镇的版画，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建设中，因为修建水电站，这个镇子淹没在了江底。这张依据汤姆森拍摄于 1870 年前后的照片制作的版画保留下了该闽江段珍贵的场景。《莱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刊登的 1879 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上海”版画，就是艺术家 W.F.Bainbridge 依据照片创作的摄影版画，这位摄影家应为外籍人士，他拍摄的底片可能在外国某个博物馆的犄角旮旯里静静地等待着中国人的到来，而这张“摄影版画”，不仅向人们展示了 1879 年 5 月 17 日下午发生在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欢迎仪式的盛况，也留存下当年号称远东巴黎的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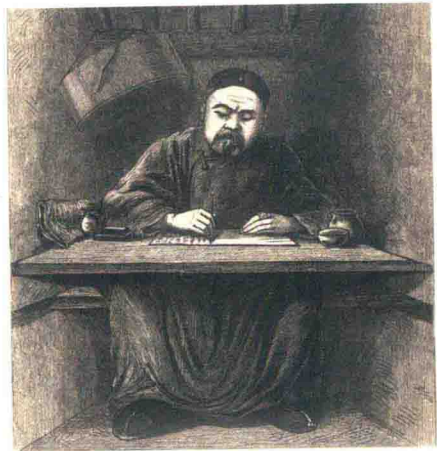
[1] 泰瑞·贝内特：《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 1861—1879》，101 页，中国摄影出版社，2013 年。

港的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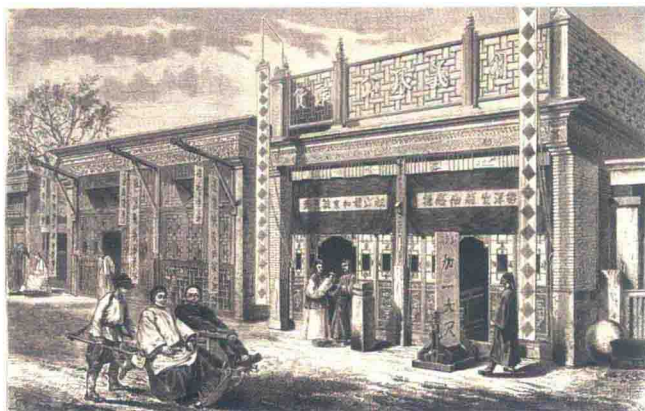
19世纪出版的很多图书也大量采用了摄影版画，如1876年法国桦谢书店出版的886页的法文《环游世界》（*Tour du Monde*），该书采用了51张摄影版画，内容包括了人文、风景和人物的影像。此书不仅是研究19世纪70年代中西方视觉传播的珍贵史料，也是收藏早期摄影的重要参考书，其中很多版画的原型来自1862—1867年间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的莫拉克医生（Dr. George Morach），这批摄影版画表明莫拉克医生不仅拍摄风光，还拍摄有很多肖像，其摄影的视觉构成和表达，与闻名于世的约翰·汤姆森比较，毫不逊色，但比汤姆森早了十年！《环游世界》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丝线索，莫拉克应该是中国摄影史上需要重视和研究的一位摄影家。

目前笔者收藏的刊登摄影版画的重要出版物有《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ions of London News*），英国《画报》（*The Graphic*），《哈泼斯》周报（*Happer's Weekly*），《莱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法国《画报》（*L'illustration*）等。《世界旅行》（*Tour du Monde*）、《环游世界》（*Tour du Monde*, 1876年）、《中国》（*La CHINA*, 1905年）、《马六甲、南中国海和中国》（*Mal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1875年），《格兰特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with General Grant*, 1879年）等图书中，也刊登有为数不少的摄影版画。

但是，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和加工，摄影版画不可避免地带入了作者的主观想象和猜测，在那些从未到访中国的西方艺术家手中，版画上的中国人物常常具有西方容貌，而且画面中的场景也常常与客观真实相左。比如1873年3月8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全版刊登的版画《北京考场》，其视觉元素主要取才于赖阿芳等摄影家拍摄



北京考场，木版画，1873年，根据赖阿芳等人拍摄的照片制作



中国人力车，木版画，19世纪80年代，
根据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制作



京剧，木版画，19世纪80年代，
根据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制作



北京街头，木版画，19世纪80年代，
根据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制作

的广东考场，流传很广的《京剧》，其视觉元素来源于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拍摄的多张包括京剧和多种地方戏曲的照片，版画《北京街景》的视觉元素来自汤姆森拍摄的北方的老者、北京的“拉洋片”、红墙街道、福州挑粪人和台湾土族等多张照片。这些版画广泛地刊登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西方众多的报刊图书中，可能误导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观看，并造成今天的中国社会误读自己曾经的历史。

三、摄影版画的“艺术”

笔者目前收藏的摄影版画有多种不同的形态，不仅有上述依据照片创作的版画，也有为了传播视觉信息而翻拍的版



李鸿章，木版画，1894年

画照片。更为有趣的是一幅依据托马斯·切尔德(Thomas Child)拍摄的皇室出行照片制作的版画,后来又使用8英寸×10英寸的大画幅相机拍摄,重新制成蛋白照片。这一现象的原因至今还让人费解。

1936年,本雅明在《绘画与摄影》一文中,纪录下了摄影术发明后第一个百年中,绘画与摄影的纠结、抗衡、较量和融合。从绘画挑战摄影到绘画逃离摄影,从绘画临摹摄影到摄影传播绘画,从绘画利用摄影到绘画主宰摄影……最后在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格局中,在揭示社会、保存历史的多个层面上,将摄影和绘画统一在了“艺术”的旗帜下。^[1]

摄影版画作为反映19世纪绘画与摄影交织的艺术形态,作为早期摄影史重要的视觉表达形态,在中国一直未能受到重视和研究。对一百多年前曾经出现、传播并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观看和想象的版画,“中国人作为画中的主体,浑然不知这些画的存在,更不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窥视和读解”。这“不仅仅意在重温民族的失败,而在探讨那些‘先进国家’和‘先进文化’对中国制胜的原因”^[2]。幸运的是,近年来国外出版的不少研究专著意识到了摄影版画作为19世纪东西方视觉文化交流的重要形态。这必将在文化交流史、艺术史和摄影史中开辟出一片新的研究领域。

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版画的研究和收藏才刚刚开始。

曾璜简介: 中国摄影家协会摄影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增加传播能力建设千人计划学者。

[1] 本雅明:《绘画与摄影》,《迎向灵光消失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1936年),许绮玲、林志明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陈丹青:《历史与观看》,《西方版画与北京城》,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

| 引言

对华战争是当前的焦点事件之一。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本介绍中国历史、描述中国风土人情的书，必定会受到英国民众的欢迎。中国这个重要的国家，与我们相隔万里，而正在进行的战争使得读者们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如此，不同观察者眼中的中国，各不相同，矛盾之处比比皆是。中国幅员辽阔，东西与南北跨度大致相当，约为 1400 英里，人口约 3 亿 5 千万，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国家。当欧洲大陆尚处于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中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早于欧洲世界许多世纪，中国就已经拥有了卓越的艺术品——而我们往往正是通过艺术品来评判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即便是一些现代国家，在公共建设的规模上，比起中国仍然相形见绌。两千年前，中国修建起了“万里长城”（实际长度是 1500 英里）。早于欧洲世界 400 年，中国开凿了一条长达 700 英里的运河，当时欧洲世界尚不知运河为何物。“面对这么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全神贯注，最理性冷静的观察者也难免浮想联翩。”

在政治哲学家看来，凡事有利必有弊。这个伟大的帝国，帝王高高在上，无数的臣民出于习惯，麻木地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帝国的军队孱弱不堪，民众稍做反抗，军队便会土崩瓦解。这个国家并非毫无知识的蛮荒之地，人民富于教养，热爱知识的程度远非其他国家可比。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已经延续了两千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从未发生过变化（至少主体没变）。中国人早期在文化与艺术领域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中国物产富饶，却仍两度遭受游牧民族的全面入侵。他惩罚不了周边国家的海盗，也平定不了疆域内不停制造麻烦的小部族。在人们眼中，这个庞然大物击垮那些小部族本应轻而易举。衙役们似乎权势很大，但实际上却不堪一击，他们习惯于屈服在官员面前。这个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互相矛盾，其间交织着智慧与愚蠢，既不乏深刻的思想，也时常可以见到肤浅的错误。国家支持艺术与科学，同时却抵制外来的先进事物；鼓励国内贸易，抑制对外贸易；大力发展国内制造业与商业贸易，却不使用贵重金属作为交易货币；深陷人口众多与资源匮乏的危机，却仍鼓励人口增长。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矛盾现象，部分原因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物理特性、特殊的政治体制、宗教制度以及妇女们卑下的社会地位。接下来我们就从以上这些方面来探讨一下中国的国情。

中国南部和东部是辽阔的海洋，风急浪高；北部是大片的沙漠，寸草不生；西

部是连绵高耸的山脉，山顶终年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即便是在夏天，也会让人陡然生出一阵阵寒意。上文曾说过，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集权国家，东西横跨 1400 英里。辽阔的国土上，数不清的山脉纵横交错，两条宽广的河流横贯东西。它们发源自青藏高原，蜿蜒流淌，最后汇入大海。这里气候多样，作物种类繁多，人民可以自给自足，完全不用依赖其他国家。经济上自给自足，统治者傲慢自大，于是，国家便开始闭关锁国，而自我封闭也正是中国人的特点之一。中国幅员辽阔，地理位置优越，上天如此厚待于它，有心使它成为世界的商业中心（多样的气候与丰富的物产是文明中心的一大特征），但是这里的人们却没有充分利用上天的恩赐，他们目光狭隘，曲解了自然的本意。正是因为自然资源丰富，他们才断然拒绝与其他国家进行商业贸易。同样，借助于帝国内为数众多的运河，各省之间进行商业贸易，以满足城市与乡村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原则上，中国政府是有史以来最专制的政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皇帝至高无上，尊贵无比。他掌握着帝国内所有臣民的生与死，支配帝国内所有的财产，可以决定由谁来继承皇位。帝国内等级森严，下级必须对上级负责，丝毫也不能越级行事。在中国，没有可以世袭的贵族头衔，朝廷重臣和地方大员都由皇帝任命，或者根据他们的德行来举荐。帝国内，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统治者强烈反对册封贵族，王爷的子嗣三代之后同样可能沦为平民。

等级制度，或者说父权制度，长久以来一直都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早出现在孔子编纂的“四书”中。政府内，六部分工协作，使得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内阁”由四位（满汉各两人）深受皇帝宠信的大臣构成。内阁下面是“议政处”，由众多出身于翰林院的大臣组成。朝廷的政策由六部负责制定和具体实施。六部分别是吏部（负责全国文官的考核和任命）、户部（负责全国的财政事务）、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中央政府还没有督察院，督察院有 40—50 名官员，他们在全国各地巡视，就像间谍一样，然后向中央政府汇报视察的结果。尽管他们的使命至关重要，但他们却常常因言获罪，惨遭贬职。巡抚是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有些地方两个省份还会有一个总督，总督之下设两个巡抚，分别负责一个省份，广东和它临近的省份就是如此。中国的总督和欧洲的总督职权相当。吏部官员、户部官员、负责税收的官员，以及其他文职官员会被派往全国各地。中国地方上的文职官员总数不少于 14000 人。全国军队人数大约有 70 万。北京的兵部负责处理与军队有关的事务。文武官员的品级不同，官帽顶部顶珠的颜色也不同。

尽管清政府是一个绝对的专制政府，但可以设想，由于父权制的影响，人们可以把它改造成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不过，中国人民十分软弱，毫无个人尊严可言，他们只是专制机器的一个个小零件。在中国，政府的触角无处不在，个人无

处藏身。一切荣誉都来自皇帝与朝廷的赏赐，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蝇营狗苟的钻营之徒，想尽办法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政府派遣密探，严密地监督人民，给人民造成种种束缚。这种束缚就像毒蛇爬行过后留下的痕迹一样，遍布在这个辽阔的国家里，使得人民的自主意识逐渐退化。人们意识不到个人存在的神圣性，对他们而言，比起上天的旨意，人们的首要任务是遵守皇帝的诏令。

中国人讲究孝道，注重家庭，这同样体现在国家的法律中。父亲是一家之主，可以随意对待子女，甚至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这表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正在退化。清朝政府保守封闭，禁止百姓出国旅行。尽管清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它的统治究竟还能持续多久，仍然是个未知数。帝国西南部，苗族的反抗斗争至今尚未平息，全国遍布着各种秘密帮会，帝国最繁荣富庶地带的农民起义^[1]也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平息。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宗教问题，透过它，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重大区别。在中国，宗教自然也是控制在政府的手里。中国早期盛行多神崇拜，我们可以在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中得到印证。天、地、空气、海洋，都分别由某一个特定的神仙掌管。陆地上有土地公，大海里有龙王爷。人们敬畏每一位神仙，他们向神仙贡献祭品，举行各种祭拜仪式，祈求神仙的保佑。比如，收获之后，农民会把收获的第一批果实献祭。儒教盛行全国，提倡尊重祖先，严格遵守孔子的教义。儒教是国教，除了儒教，佛教和道教同样也拥有很多信徒。中国的宗教非常有意思，我们会在后文中加以详细介绍。

与很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女性的地位也很低下。她们不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在家里，她们也不能和男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不过，对于下层劳动阶层，第一条规则被打破了，不管已婚还是未婚，下层女性都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穷苦人家攒够了钱，就会为家中的未婚男子娶妻。女方往往没有什么财产，不过提亲的男方会给女方家里一笔彩礼，数目多少要根据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而定。婚礼结束之后，这对新人才能第一次看到对方的长相。在中国，休妻的理由多种多样，比如妻子话太多，或者不孝顺公婆。欧洲女性看到这些，肯定会大吃一惊。即便中国的男性性情温和，妻子的境况会有所改善，但她们的地位仍然不容乐观，仅仅比奴隶强一些。妻子还要忍受丈夫和婆家人的酷刑，甚至还有可能被丈夫卖掉，用来抵偿丈夫娶妻的花销。由此可知，中国女性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本应该对民族文化和进步起到重大作用的女性，完全被中国社会忽略了。

由于篇幅的原因，有关中国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历史、社会环境、艺术、科学、

[1] 指太平天国运动。——译者。

贸易、商业、制造业等，笔者不再赘述。下面，让我们用宝宁爵士^[1]（他曾长期在广州居住生活）所写的一份文件，作为引言的结尾。这份文件刊登在最近出版的《社会统计》上，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的状况。在这份写于1855年的文件中，宝宁爵士就伦敦总登记官提出的若干问题做了一番解释。虽说是一篇科学通讯，但文章并没有采取官方通讯的口吻，文风反而很自由灵活。因此，尽管这是一篇统计调查报告，但文中与中国社会有关的信息却很有趣。

事实上，从嘉庆时期起，中国政府已经有43年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了，因此，以下数据的真实性十分值得怀疑。数据显示，中国现在人口总数是362447183。不过基于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官方的这一统计数字大体上还是可靠的。我们保守估计，中国现在的人口在3.5亿—4亿之间。中国刑法规定，在人口普查中，不如实上报信息会被处以100下鞭刑。地方官每年都要统计当地的人口数目，这是他们的职责之一。不过，我怀疑他们并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一职责，面对欺瞒，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并不会认真处罚。

几年前，我曾经就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宁波当地一位负责统计汇报人口数目的官员进行过一番探讨。在签订通商协议的5个港口城市中，宁波算不上是一个发达的大城市，但当地的实际人口却远远超过官方预测的数目。

需要说明的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共由18个省份构成。在1812年的人口普查中，每平方公里上居住着268人，比起欧洲国家，人口密度要小得多。

中国传统把人分成士、农、工、商四等。此外，戏子、杂耍艺人、乞丐、罪犯等被认为是下三滥，社会地位底下，尽管他们数目庞大，但在人口普查中，这些人可能并没有被统计在内。另外，有关官员可能也没有把穷乡僻壤统计在内，他们只统计了那些交通方便、经济富庶的地区。

众多证据显示，人口过剩使得中国粮食缺口越来越大，人们为此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先前有段时期，中国农业连年取得大丰收，收获的大米不仅可以供给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剩余出口国外。但近年来，中国从菲律宾、暹罗以及其他国家大量进口粮食，以弥补国内的粮食缺口。饥荒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国家储备的粮食却完全无法满足人民的消耗。毫无疑问，国内动荡的局势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突发性的洪水、火灾等短期的自然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农业生产。但是，即便以上问题不存在，中国的粮食短缺现象依然不可避免。这是因为中国人口增长得太快了，完全超出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我们知道，人口在不断增长，粮食需求增大，

[1] 宝宁（John Bowring, 1792—1872年），英国经济学家，旅行家，英国第四任驻香港总督。——译者。

而水灾、旱灾、火灾、蝗灾以及恶劣气候等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自然灾害往往又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在中国，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人力劳动，看上去就像园艺一样。

很少有人移民到中国，却有众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这也能证明中国目前人口过剩。移民主要出自广东和福建两省，这两个省份总人口在3400万—3500万之间，其中有200多万，将近300万人迁居国外。暹罗大致有150万中国人，其中仅在首都曼谷一地就有20余万中国人定居。印度尼西亚也散布着很多中国人。据统计，爪哇有13.6万中国人。在印度支那，有若干船只专门负责把中国移民运往加利福尼亚等地。很多中国人移居到澳大利亚、菲律宾、圣维治群岛，以及美国中南部的西海岸。还有一部分来到英属印度。另外，英属西印度群岛、哈瓦那等地也有很多中国人。每年有1万多中国人来到新加坡，但从新加坡回国的中国人却仅有2000余人。

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人口迁居到蒙古和西藏等地区。另外，在土地肥沃的台湾和海南等地，大量外来人口蜂拥而至，开荒种田，规模很快便超过了当地的土著。然而，尽管很多人背井离乡，出国谋生，中国人口却丝毫不见减少。远在异国的中国人，时刻想念着回家祭祖，把祭品供奉在先祖们的坟前，但事实上，十个人之中，往往只有一个真正能够回到家乡。由于疾病、经营不善、船只失事，以及其他种种灾祸，很多中国移民葬身异国他乡，这一比例之高，令人心惊。

很多中国人以捕鱼为生，这一方面证明中国人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同时也表明这个国家人口严重过剩，有限的耕地已经不堪重负。在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农民的社会地位仅次于知识分子。据统计，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以捕鱼为生。沿海一带，岸边布满了船只。有些渔民集体进行渔业捕捞，有些渔民则独自捕鱼。中国人捕鱼的方式五花八门，捕鱼用的渔网各式各样，大的围网面积达数平方公里，小孩子用的格网又十分小巧。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捕鱼。晚上，他们借着月光，或者点起火把捕鱼，甚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他们也可以捕鱼。他们捕鱼用的圈套和设备种类之多，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他们利用各式渔船捕鱼，有可能要在风急浪高的大海上连续颠簸几周。他们静坐在海边的石头上捕鱼，训练鸬鹚捕鱼，潜入水底捕鱼，或者用鱼线、鱼钩捕鱼。你能在任何一条河上看到捕鱼的人，你也会发现，几乎每一处湖泊与池塘都养殖着大量的鱼类。在中国，一片鱼塘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一样珍贵。清晨时分，城市里出现了很多贩卖活鱼的小贩，他们把鱼放在水桶里，当天卖不完，第二天继续卖，桶里的鱼仍然活蹦乱跳。湖泊与池塘里除了出产大量的鱼类，还出产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根茎与种子。其中，海芋、荸荠，以及莲藕最常见。

在中国，有很多家庭生活在水上。他们在船上出生，在船上读书，在船上结婚生子，在船上挣钱养家，最后死在船上，几乎一生都在船上度过。他们生于船上，死于船上，除了栖身其中的船篷，他们不曾拥有、也从未梦想过在陆地上寻找一处可以遮风挡